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李商隐诗选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

742

I222.742

17

2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李商隐诗选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A 543381

李商隐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3}{4}$ 插页2

1978年8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664

定价0.70元

前 言

李商隐是唐代后期杰出的、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既富有文采，又有较强的政治性，不少诗篇对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尖锐地揭露了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反映了唐王朝后期危机四伏的时代面貌，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在诗歌艺术上，他通过惨淡经营，突破了由于盛唐和中唐作家多方开拓而难乎为继的局面，开辟出了新的境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一〕}，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这时，曾经是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繁荣的唐王朝，已经趋于衰颓和没落。李商隐童年时期，唐朝廷虽一度削平藩镇，出现了短暂的所谓“元和中兴”，但政治上的

〔一〕 关于李商隐的生年有多种推断，我们采用冯浩和岑仲勉的说法。见冯浩《玉谿生年谱》、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

种种积弊依然存在，军事上一时的胜利并不巩固；加以宪宗以后的两个皇帝（穆宗、敬宗）特别荒淫昏愤，因而中兴的局面转眼即逝，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唐王朝进入了危机更加深重的后期。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一时期急剧发展。中唐以后，均田制废弛，两税法施行，地主大量占有土地完全合法化，许多农民在地主的兼并下破产。德宗时政论家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一〕陆贽所讲的是均田户下降为佃农的情况，其后问题更为严重，文宗开成二年春，李商隐自兴元返回长安，沿途所见，一片荒凉破败，肥沃的关中地区，竟至“十室无一存”。

由于统治集团奢侈浪费，官吏贪污成风，加上战乱频仍、军费开支浩大，唐后期赋税的苛重和名目的繁多，都达到了前代少有的程度，而庄园地主又采取隐匿田亩等手段，将大量赋税和差役转嫁到贫苦的农户身上。农民走投无路，由流散逃亡，进而聚集为小股的起义武装。“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李商隐这是写的长安近郊的情况，其它地区自然比京畿更为严重。

〔一〕《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迅速加剧。当时，在地方，作为区域性大地主集团的代表——藩镇，常常拥兵与朝廷对抗，穆宗以后，河北三镇再度恢复割据，其它地区也先后出现一些割据和半割据者。在朝廷，宦官专权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内握军权，外连藩镇，凌驾于朝官之上，操纵着皇帝的废立生死，“威慑朝廷，势倾海内”，成为盘踞在中央政权内一股最反动的势力。与宦官专政于内、藩镇割据于外相伴，朝官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纷争，分成所谓牛李两党^{〔一〕}，在一系列问题上“是非蜂起”。朝官中的混乱、倾轧，标志着统治阶级的中坚和核心部分已经解体，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李商隐就生活在唐王朝濒于土崩瓦解的末世。他出生于小官僚家庭，从高祖至其父亲，都只做过县令、县尉和州郡僚佐一类低级的地方官吏，而且曾祖、祖父都死得早，“百岁无业”，“家惟屡空”。九岁时，其父李嗣又在浙江幕府中病故，李商隐奉丧侍母由浙江返回郑州时，生活更是艰难：“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祔故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二〕}这种地位和经历，既使他对社会生活较早地有所体察，也促使他自幼“悬头苦学”，企图由科举进身，以“振兴家道”。当时，他跟随堂叔李某求学，这位叔父擅长古诗文和书法，不愿随

〔一〕 指分别以李宗闵、牛僧孺（牛党）和以李德裕、郑覃（李党）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官僚集团。

〔二〕 李商隐：《祭裴氏姊文》。

俗浮沉，一生隐居不仕，李商隐对他甚为尊敬。在他的熏陶下，李商隐显得幼年早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一〕因而较早地走上了仕途。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幕僚。从这时起，到开成二年(837)，他除有一年左右依于重表叔崔戎外，一直在令狐楚幕下。令狐楚的地位很显赫，宪宗时当过宰相，属于牛党，他把李商隐引进幕府，可能有为牛党罗致人才的用意。唐代官方文书通用骈体，令狐楚叫李商隐跟自己的儿子令狐绹等同学，亲自教做骈文。李商隐原是由于叔父的影响，“未尝一为今体文(骈文)”，此时在令狐楚的指点下，很快就青出于蓝，以骈体章奏而名闻当世。

自大和七年起，李商隐曾三次应进士考试。开成二年，由于令狐绹的推荐，得中进士。同年冬，令狐楚死。李商隐失去幕职，只好另谋出路，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其才，并赏识他的思想与言论〔二〕，不久又把女儿嫁给了他。当时，王茂元被视为李党，李商隐转依于他的门下，这就触犯了朋党的戒律，被认为是“背恩”，招致了令狐绹和牛党中一些人的忌恨。开成三年，他应博学宏辞考试，本已为考官所取，复审时被某一权要抹去了名字。这次意外的打击，使李商隐对朋党之间的勾心斗角感到厌

〔一〕 李商隐《樊南甲集序》。

〔二〕 李商隐自述王茂元与他相处时：“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每有论次，必蒙褒称。”

恶和畏惧，发出了“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的喟叹。但是，那些朋党偏见很深的人依然放不过他。开成四年，他经过吏部考试在朝廷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官品虽低，而职属清要，朋党势力当然要排挤他，果然不久就被调为弘农尉，从清职降成了俗吏。

文宗朝是李商隐初入仕途、积极求取功名的时期，尽管频遭朋党势力的打击，但他一直很富有政治热情。当时，宦官猖獗。文宗于大和末年，任用李训、郑注等人，企图消灭宦官，结果失败，史称“甘露之变”。目睹朝廷的危机，李商隐甚为忧愤。甘露事变后，他通过诗歌创作，有力地抨击了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反映了农村的凋敝景象，成为他创作上的第一个高潮。

唐文宗死后，继位的武宗任李德裕作宰相，朝政有一些起色。会昌三年(843)，唐朝廷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会昌四年，平定昭义镇刘稹的叛乱，并废除佛教，裁汰冗官，着手经营恢复河湟地区。李商隐对李德裕为加强国家安定统一所采取的措施是赞成的。他自己亦于会昌二年再次入秘书省任正字。按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他或许有可能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但不久又因母亲病故而离官，经过三年服丧，返回秘书省正字任时，已是会昌五年的冬天。几个月后，武宗就死了。

会昌阶段，李商隐大部分时间在关中和永乐（今山西芮城县）一带闲居。“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他对于无所事事，不能为唐王朝“中兴”事业出力，感到十

分惋惜。在创作中对于抗击回鹘、讨伐刘稹等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作了反映，对武宗晚年求神仙、宠女色等行为，也进行了讽刺。

唐宣宗统治时期，先后任用善于迎合己意、“恃宠保位”〔一〕的白敏中、令狐绹等做宰相。对武宗时抗击回鹘、废除佛教、裁汰冗官等措施，一概加以否定，政治上的弊端较前朝更多，人民的反抗也愈演愈烈，从川陕边境，到长江中下游，不断出现农民起义武装，全国性的农民革命风暴渐渐迫近了。史称“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贤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二〕说明大中之政比以往各朝更为反动腐朽。这样的政治，李商隐自然会感到是很沉重的压抑，再加上对他宿憾很深的令狐绹日益得势，使他的处境变得格外困难，因而沉痛地发出了“途穷”之叹。这一阶段，他大部分时间追随郑亚、卢弘止、柳仲郢在桂州、徐州、梓州等地任幕僚。尽管这三位幕主都是会昌年间受到李德裕重用、并在政治上有一定进步倾向的人物，但整个政局是那样黑暗，幕主们能给他多少慰藉呢！大中五年，他的妻子王氏因病去世，子女尚皆幼小。仕途的失意，又兼家庭的变故，更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居梓幕期间心情常常抑郁不舒。大中九年，他随柳仲郢自梓州回到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如何匡国分，不与凤心期？”就在这一年，诗

〔一〕 范祖禹《唐鉴》。

〔二〕 《新唐书》卷 225。

人怀着“匡国”无门、“夙心”未遂的悲愤，寂寞地死去了，年仅四十六岁。

宣宗朝是李商隐生活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桂幕及其稍后，诗人的心情比较愤激，作品相当丰富，形成了可以与他在甘露事变前后创作相媲美的另一高潮。入川后，由于抑郁苦闷，“于文墨意绪阔略”〔一〕，思想上和创作上都不如早年那样富有热力了。不过，诗人那种“殷浩当世之心机”〔二〕，毕竟没有完全消磨，还是写了不少政治性较强的诗，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并没有向自己不幸的命运和黑暗政治势力屈服。

李商隐的一生，大体上与晚唐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相终始。他处在朋党倾轧的漩涡中，屡遭排抑，不仅遭遇很不幸，连人格也受到了诬毁，象新、旧《唐书》就说他“无行”、“放利偷合”。其实，李商隐在纷乱的党争中所持的态度大体上还是值得肯定的。牛李党争，是唐后期病态的、复杂的政治现象。两党最初的形成，可能与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有关。但在后来的长期激烈的纷争中，各自的成员都趋向复杂化，双方既有人出身科第，也有人出身世族。讲究门第的李德裕在武宗朝执政时，为了有效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还曾“颇升寒素”〔三〕，以至重用象石雄那样出身下层的武人。从思想政治倾向上看，同一集团

〔一〕 李商隐《樊南乙集叙》。

〔二〕 李商隐《献舍人彭城公启》。

〔三〕 见《唐语林》卷七。《唐摭言》亦有类似记载。

内的成员也不一致。如牛党党魁李宗闵、李逢吉勾结宦官，同属牛党的令狐楚对宦官就曾有过抵制〔一〕；对待藩镇，牛僧孺姑息妥协，而牛党的杜牧就力主讨伐；会昌时期，朝官中李党占优势，但赞同李德裕讨伐刘稹的并不多。因此，无论对牛党或李党，都不宜笼统地全盘肯定或否定，而应根据各个人物的具体政治实践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李商隐并未加入任何一党，但他在两党中都有一些关系处得较密切的人，因此被人误解为投机。其实，当时尽管两党对立，但其成员之间并不乏交往，如史载牛党的宰相崔珙与李德裕“亲善”〔二〕，李德裕曾擢用原属牛党的柳仲郢就是显例。这从李商隐代王茂元、郑亚写的许多给牛党成员的书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李商隐和两党成员都有交往，正是与这两大官僚集团既互相对立、又不乏联系相一致的，不能因此就断定为“放利偷合”。他在两个朋党势力此伏彼起的情况下，并不因某党一时得势就趋向某一方，也不抱朋党的偏见去看人，他对牛党的杜牧、刘蕡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李党的郑亚、卢弘止等人也很亲近。他和李德裕并没有直接交往，但当大中初年李德裕遭贬时又寄以同情，肯定其会昌年间的功绩。这些，都说明他尽管

〔一〕 令狐楚曾将宦官所恨的刘蕡引入幕府。甘露事变后，他在制书中叙王涯、贾餗反事浮泛，仇士良不悦。开成元年上巳赐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诛大臣，独称疾不赴。同年三月，楚奏请收埋王涯等尸骨，仇士良潜使人弃骨于渭水。

〔二〕 《新唐书·崔珙传》。

是牛李党争的受害者，但并不因此抹杀它们某些成员的是非功过，所持的态度还是较为公允的。过去，有些人强为李商隐划分党派，其实并不能由此搞清他在政治上究竟是进步还是落后。在晚唐那种党派纷争的混乱局面下，一个积极关心政治、富有正义感的诗人，可能不躋足于任何一个官僚集团，但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却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和倾向性，而这，正是判定李商隐政治态度的主要依据。

当然，李商隐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成员，剥削阶级的庸俗气是免不了的。他因婚于王氏得罪了令狐绹，为了求得令狐绹的谅解，多次陈情表白。宣宗朝令狐绹官居高位，更一再请求援引。这些都是他庸俗一面表现得十分严重和露骨的地方。但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对他的批判，与过去一些封建文人骂他“诡薄”、“背恩”完全是两回事。相反，他那种不抱党派偏见的态度，我们倒应给予肯定。

李商隐在创作上取得突出的成就，除了在政治上倾向进步外，跟他的思想比较解放也有很大关系。他早年在《上崔华州书》中说：

“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后来，他又在多少带有点自况意味的《元结文集后序》中说：

“论者徒曰次山（元结）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耶？”

从以上两段带有点离经叛道倾向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把儒学视为至高无上，而是具有独辟门径的创新精神。他认为“道”不是儒者独家的发明创造，人人都在实行自己的道。古往今来千万种著作，代表着高下难分的各种政治学术派别，不对孔氏盲目地推崇。责备元结“不师孔氏为非”，要求别人“学道必求古”，逼着人们处处去效法孔氏，都是没道理的。这种思想出现在九世纪上半叶，应该说是很进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多少突破儒家政治伦理的束缚，并在创作上摆脱传统的“尊圣”、“宗经”等文艺观的限制，“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忌讳时世”，写出许多大胆地揭露黑暗现实、抨击腐朽势力、带有若干民主性的诗篇。

二

李商隐是关心现实政治和封建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现存的约六百首诗中，政治诗占了六分之一〔一〕。这个比重，

〔一〕 初步统计，政治诗共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除直接反映现实政治的以外，还包括政治批判色彩很浓、具有托讽现实意味的咏史诗，及少数词意隐约、难以指实但大体上可肯定是对现实政治事件而发的诗篇（如《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明神》等）。

即使与唐代以写政治诗著称的诗人相比,也是相当突出的。九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文、武、宣三朝)的许多军事政治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他都作出了反映。这些作品,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认识意义的部分,也是判断其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

藩镇割据叛乱,是唐代中、后期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李商隐对此始终密切关注,写下了大量反映这一问题的诗篇。他热烈拥护朝廷的历次平叛战争,热情赞颂对国家统一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宰臣和将领,对凭险割据、恃强叛乱者极为憎恨、蔑视,这在《复京》、《浑河中》、《韩碑》、《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登霍山驿楼》、《井络》等诗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这类作品不仅倾向鲜明,而且认识相当深刻。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长期割据叛乱的局面使他有可能从纵的历史发展和横的社会联系上去认识藩镇割据的严重危害以及这一局面形成与延续的原因。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首长诗中,他追溯历史,推原祸始,揭露开元以来朝政的腐败、上层的淫奢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主因,并进而指出藩镇长期割据叛乱不仅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深化了国家的财政危机,致使边防空虚、河源失陷,而且使农村生产凋敝,农民生活极端穷困。而这一“疮疽”之患长期为害,又在于执政者腐朽无能。“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这是他观察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根本观点。在《随师东》中,他透过讨叛将领冒功邀赏、擅自进退的现象,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腐败,朝无贤

臣；《寿安公主出降》一诗，更深刻揭露了“送王姬”的“礼”，实质上是笼络讨好藩镇的屈辱妥协政策。把反对藩镇和批判上层统治集团紧密结合起来，是他这类诗歌的显著特色。

李商隐抨击宦官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他对黑暗势力的斗争精神。这一类诗，多数写于甘露之变以后朝野间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的时期。当时，连白居易这样曾愤怒揭露过宦官的诗人也碍于政治环境的黑暗而不得不收敛起战斗的诗笔，而李商隐却在《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禺侯因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曲江》等诗篇中，直斥宦官为“凶徒”，愤怒揭露他们篡权乱政、大肆杀戮株连的罪行和践踏法纪、劫夺财货的行径，并以沉痛的笔调描绘出长安内外昼号夜哭、冤鬼悲歌的凄惨恐怖景象，表达了广大士民渴望平乱的愿望。对甘露之变这一“天荒地变”式的重大政治事件，他的感受非常强烈、深刻，因而在《曲江》中抒写了荆棘铜驼的忧虑，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他酬赠、哭吊刘蕡的一系列诗篇，也倾注了对宦官黑暗势力的憎恨。他把刘蕡受贬冤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愤的政治环境下加以叙写，把刘蕡“扶皇运”的抱负、直言敢谏的政治品质与其悲剧遭遇对照起来描写，把自己与刘蕡之间深厚的情谊置于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从而使这些作品成为愤怒控诉宦官乱政、具有强烈政治批判色彩的战斗诗章。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它是和

当时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最高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昏愤腐朽、生活上的奢侈糜烂分不开的。李商隐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作品，在他的政治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类作品，虽多采取“咏史”的形式，但都针对现实，有感而发。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形象地显示出封建统治者生活上的奢侈淫逸与政治上的昏愤腐朽之间的联系。如《富平少侯》将少年袭位的贵族奢靡好色的行为放在国家面临深重危机的环境下来描写，尖锐讽刺其醉生梦死，不恤国事；七绝《隋宫》将炀帝“乘兴南游”的纵欲行为和他昏愚拒谏、肆意糟塌民财民力的腐朽政治面目联系起来，以显示其覆亡的必然性，用意都很深警。为了深寓警戒之意，作者往往选取历史上突出的亡国乱政的皇帝以托讽，揭露他们贪欲无穷，不顾一切后果，沉迷不悟，无视历史教训，终于国破身亡，自取其祸，嘲笑之尖刻，讽刺之辛辣，为古代封建文人政治讽刺诗中所少见。甚至连本朝帝王唐玄宗，诗人在讽刺其荒淫失政时，也不留情面，不稍掩饰。《龙池》、《骊山有感》、《马嵬》等诗，往往被一些囿于封建伦理的评者斥为“大伤诗教”、“乖大体”、“太轻薄”，其实，这正是上述诗作可贵的思想特色。

唐代后期许多皇帝迷信神仙方术，妄求长生，蠹财害民，荒废政事。诗人针对这一现象所写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求仙的愚妄。著名的《瑶池》在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出西王母盼不到穆王重来的情节，含意深长地显示了所谓神仙也不能使求仙者逃脱死亡，连神仙和求仙者都一起

作了兜底的批判^{〔一〕}。

在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进行揭露抨击的同时，李商隐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反映。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他写出京畿农村在天灾人祸侵袭下荒凉残破的景象和农民无以为生、被迫为“盗”的情况，反映了藩镇割据、宦官乱政、统治集团重赋剥削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说明他对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有所体察。《即日》、《灞岸》、《异俗》等诗，对人民在回鹘统治者侵掠和酷虐政治压迫下所受的痛苦，也流露了一定的同情。但这类作品在他的政治诗中仅占极少数，比起他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揭露抨击，显得远为逊色。

李商隐是政治上有抱负而遭遇非常不幸的诗人。抒写身世遭遇，表现自己政治抱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这类作品，在数量上超过了他的政治诗。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如《初食笋呈座中》、《安定城楼》、《晚晴》、《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幽居冬暮》等篇，表现了他一生各个不同时期政治上积极奋发的精神和关怀国家命运的思想感情。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怀有“凌云一寸心”，以后在政治上虽屡遭挫折，仍然希求有所作为，不时发出“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这种老骥伏枥式的积极呼声，直到晚期

〔一〕 李商隐早年曾“学仙玉阳东”，但从他一系列讽刺求仙的作品看，他对道教及神仙方术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早年学道，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性质类似隐逸。